

《西方凝视下的中国：英国 1980～2000 年电视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述评*

Cao, Qing. 2014. *China under Western Gaze: Representing China in the British Television Documentaries 1980-2000*.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xix + 242. ISBN: 978-9814578295

穆浩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1. 引言

作为一种报道形式，纪录片是编导人员、电视台与制作公司在一定社会大背景下最终完成的，借用费尔克劳（Fairclough, 1989）的术语，就是个人、机构及社会三个层面话语运作与互动的结果。英国在 20 世纪末有关中国的电视纪录片便经历了一个这样的制作过程。英国杜伦大学的曹青先生所著的《西方凝视下的中国：英国 1980～2000 年电视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具体考察了 20 世纪最后 20 年英国电视台播放的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分析其构建中国形象的叙事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编导人员、电视台与制作公司制作这些纪录片的过 程，以及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的联系。

阅读这部著作，不仅感受到作者探究英国电视纪录片如何在英国民众面前构建中国形象的学术追求，而且对作者将叙事学的理论以及话语分析的方法运用在电视纪录片的研究当中颇有感触。下面，先对该书的内容作一概要介绍，然后结合我的学术经历谈一下阅读体会。

* 通讯作者：穆浩

联系地址：天津市（300204）河西区马场道 117 号，天津外国语大学

电子邮件：muhaocds@outlook.com

2. 各章内容述介

全书共八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为一个部分，为全书的案例分析提供背景知识、分析视角、方法、框架与工具。第三、四、五、六章是本书的第二部分，构成本书案例分析的主体，通过分析不同的纪录片为表达特定意图而使用的不同叙事策略，揭示纪录片内部及外部、语言与社会因素之间的权力关系。第七、八两章为一个部分，分别对全书的分析研究从话语策略与权力关系的层面进行提升和归纳。

第一章《中国形象：历史、结构与视角》主要阐述中国形象研究可能采用的视角。这一章介绍了从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到 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期间，中国与西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指出“受害者情结”是中国近代史学最显要的特征。西方对中国具有两种角色：西方既是对中国的加害者，又是财富与实力的象征，是中国效仿的对象。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和感受比较复杂，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则非常明显，那就是以负面为主。无论是 20 世纪中叶中国摆脱外部束缚、获得民族独立之前，还是中国经历改革开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在西方的形象都在各种层面显示出非积极因素。作者指出，观念与形象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纬度，是冲突与和平的关键因素。在公众层面，大众传媒对塑造公众对华认识及对华态度至关重要，了解中国形象的产生、传播及接受过程是理解中西关系重要一环。

关于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识，该书作者引用了艾萨克（Isaacs）以西方文化所特有的知识结构、历史传承及概念体系为基础的不同时期的中国形象，归纳为六个阶段，分别为敬重期（18 世纪）、蔑视期（1840—1905）、仁慈期（1905—1937）、赞赏期（1937—1944）、失望期（1944—1949）、敌意期（1949— ），以及莫舍（Mosher）进一步补充的中国形象演变史：敌意期（1949—1972）、第二赞赏期（1972—1977）、第二失望期（1977—1980）、第二仁慈期（1980—1989）。这两位学者在考察西方对华态度变迁后得出结论：随着时间推移，西方对中国形象呈钟摆式起落，周期大致与西方对华政治态度同步（p4）。在此基础上，该书作者提出 1989～2001 年期间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是“第三失望期”，2001 年至今是“失去尺度期”。

关于西方报道中国的视角，该书作者认为有两种类型，一是本原论（Woodward, 1997: 4）视角，即在报道过程中假定存在着一种可以捕捉到的、清晰的、“真实的”中国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通过揭示其继往开来、一成不变的传承性，或追溯其历史本原来确立。二是构建论（Hall, 1997: 15）视角，这一视角对如下问题更感兴趣：报道对象是什么，如何进行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报道，报道结果如何，产生何种印象，这种影响有何后果等。在西方报道中国的过程中，人们普遍认识到，构建“他者形象”是社会文

化“自我”身份建构的一部分。

第二章《电视叙事结构：再现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主要阐释了研究电视叙事结构所需要的再现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该书作者在认识到“传媒”总体上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娱乐大众、传递信息和生产话语的基础上，提出“传媒叙事”的概念，从理论和操作两个层面探讨传媒所需的语言手段。“传媒叙事”在本章被定义为传媒人为实现预设的主题而在报道中使用的叙事结构（p18）。这些叙事结构与文化认同及形象塑造之间形成互动，三者在互动中产生一套言说方式，即话语。

在这一章中，作者主要讨论了与纪录片制作者报道“他文化”相关的几个理论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所谓的“类型化角色（*dramatis personae*）”，抑或“叙事功能（*narrative function*）”（p19）。普罗普（Propp）的“类型化角色”框架基于对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研究，他指出了民间故事内部普遍存在的共性，即所有的故事都遵循某种根本性的规律，抑或公式。这个公式由各种各样的类型化角色构成，起到完成故事叙事功能的作用。这种叙事功能与诸如谁讲故事、讲什么样的故事、何时何地讲故事等具体问题关系不大；它是一个相对独立、抽象、宏观而又不易察觉的“超级”结构，因而只能通过其所起的叙事功能进行概括和定义。对于他的叙事分析框架，作者指出了不足：对当代传媒而言，新闻时事的叙事结构正向着多层次、多意义、多视角的立体方向发展，以满足不同受众的复杂需求，实现娱乐大众的目的（p20）。

第二个概念是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以叙事深层结构为基础的二元对立原则。施特劳斯将叙事的线性结构看作叙事的显性特征，而显性特征的背后则隐藏着叙事的纵向聚合深层结构。这两种结构主义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语境”的不同认识，而“语境”是现代传媒叙事分析至关重要的因素。普罗普的组合分析法常脱离社会文化的具体语境，而列维·施特劳斯则将叙事分析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同社会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联系起来。换言之，叙事研究的重点不在于谁说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这样说、如何说及为达到何种目的（p21）。

基于上述两个概念，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将现代传媒叙事区分成两种不同的层面，即“神话式”与“模仿式”层面。他将神话式与模仿式叙事看作讲故事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法。从广义上讲，神话式结构与列维·施特劳斯提出的所谓“神话”，即具有象征意义的叙事概念相通；而模仿式则指传媒能否忠实再现客观世界。从结构而言，神话式叙事类似传统民间故事的讲述方式。传媒对他文化的神话式再现是对非西方世界的一种文化想象，在西方价值语境中，传媒解读他文化时以神话式叙事传播主流价值观，千篇一律地传达社会所认可的关于他文化的观念及臆断（p22）。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传统西方报道的特质进行了剖析，他指出西方传媒是在自说

自话，是在西方语境内再现“非西方”的一出独角戏，而不是与他文化进行的对话及交流。传媒所建构的话语意义的生成依赖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体系，而不是非西方世界的客观现实。因而传媒的神话式叙事具有“双重特质”：一方面它表达了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而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社会维持现有文化秩序的集体意向（p21）。

在西方报道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时序”，因为在报道他文化过程中，传媒故事处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而后者是传媒故事意义生成的决定性因素。就具体传媒报道而言，意义产生最重要的环节是时间的因果逻辑关系。时序性层面的因果关系是叙事过程之中要素，体现事件间的互动关系。传媒报道他文化过程中，正是因果关系决定了报道的视角、态度以及所塑造的形象。逻辑结构常常决定叙事顺序，而非叙事顺序影响逻辑结构。于是时序便构成了叙事中的结构要素，即事件的时间顺序安排影响因果关系的理解，证实列维·施特劳斯所谓“逻辑隐于时序”论断之精髓所在（p23）。

在本章的最后，作者指出了纪录片的两个极端，即普罗普式的单一式线性结构以及施特劳斯式的二元对立多维结构，并提出现实中的纪录片叙事方式往往介于两种极端的叙事方式之间的观点（p33）。除此之外，作者还提到在纪录片的话语构建中的三个策略：分解化、模糊化、碎片化。

第三章《中华文明的形象》主要解析英国纪录片所建构的中华文明形象，分析重点集中在两个主题：一是儒家传统文化，另一个是鸦片战争。该书作者认为，英国电视纪录片对这两方面内容的报道显示出西方对中华文明的态度，也反映出西方文化的自我身份认同（p36）。关于儒家传统文化的报道，作者指出其核心问题是中西文化身份的构建，及这种构建所采用的视角：一类是将儒家传统看成专制及压迫的工具，第二类则将其看成仁爱及和谐社会关系的典范及源泉。两类构建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其主要差异是前者将儒家思想看作单向的效忠关系，而后者则强调双向的义务关系。关于鸦片战争纪录片的话语构建方式，作者发现两种叙事风格：一是以时间为顺序的叙事风格，这种逻辑往往用于神话式的故事结构中，许多类型化角色都按此类叙事方式构建；另一种叙事风格是以逻辑关系为主导的叙事，这种叙事风格是分裂式的，应用了“去道德化”的叙事策略。作者在本章最后做出总结：不同解读使同一件事产生不同意义，尽管分析的两部纪录片均采用了神话式结构，都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将历史事件纳入叙事逻辑框架内进行叙述，但对同一概念采用不同视角进行解读的结果却千差万别，所以作者认为纪录片背后的意识形态比纪录片本身的真实性更具有研究的意义（p60）。

第四章《再现民国时代》分析电视纪录片对 20 世纪上半叶历史的话语构建，考察的重点是纪录片话语的两个重要侧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二是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通过对电视纪录片整体叙事特征的梳理及民国时期话语的

批判性分析,解析以模式化的报道形式建构出的中国形象。

具体分析落实在三个方面:(1)以“类型化角色”叙事方式界定历史主角;(2)这些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3)主要角色所体现的社会政治意义(p61)。其中在以“类型化角色”叙事方式界定历史主角这部分中,作者谈到几种破坏叙事逻辑的叙事策略:一是通过局部化的叙事策略,破坏普罗普类型化角色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p66);二是中性化和边缘化的叙事策略,淡化了纪录片特定层面的冲突,使观众注意的焦点受控于制作者;三是去背景化和去知识化的策略,模糊了叙事角色的定位,使故事逻辑支离破碎(p69)。作者认为,以上策略的使用导致了纪录片内的类型化角色在叙事过程中被消解,意义也被肢解得凌乱不堪(p72)。

第五章《共识与偏离》分析了英国电视纪录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49—1989)中国形象的报道。这一章分析的纪录片有11部,大多制作于20世纪90年代。本章第一节对这一时期英国电视纪录片制作的社会政治背景做了介绍。作者指出,由于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些历史事件,英国90年代生产的电视纪录片大多具有政治倾向,且对中国的报道也具负面意义,这与80年代生产的纪录片在文化倾向方面形成对照。作者结合纪录片中围绕“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对中国进行的报道,具体说明了这种情况。

第六章《通往乐土之途——系列片案例研究》以BBC二台于1990年7、8月间年播放的四集电视系列纪录片为语料,进行了叙事分析、话语分析和视觉形象分析。在叙事分析部分,作者首先介绍了普罗普式类型化角色及概念:1. 初始;2. 缺失;3. 派遣;4. 英雄;5. 难题(1);6. 难题(2);7. 非分要求;8. 赠予者;9. 宝物;10. 揭露。通过叙事分析,作者指出:逻辑叙事根植于分化最深层部分,将抽象概念在观众潜意识层面贯穿起来,使其不知不觉中领会故事含义。在话语分析部分,作者提出纪录片在构建某些特殊话语的过程中采用了人格化与去人格化、中性化、伦理化与去伦理化等话语策略。在视觉形象分析部分,作者指出视觉形象既能深化神话式叙事功能,也有助于推进模仿式叙事展开。

第七章《话语策略与权力关系》在话语策略层面讨论了事实建构的文本性,在权力关系层面讨论了电视纪录片制作中机构作用所体现的语境性。关于前者,作者讨论了三种文本价值:“经验价值”“关系价值”及“评价价值”。“经验价值”指作者在纪录片文本留下的表明作者人生或文化经验的印迹或线索,表露作者的知识结构、信仰及价值观,与纪录片内容密切相关;“关系价值”指文本行文方式所流露出的对各类社会关系的认识及建构,与人际关系密不可分;“评价价值”是作者对社会现实评估在文本中留下的印迹,事关行为主体的社会文化身份。这三种“文本价值”通过纪录片叙事结构、语法及词汇

运用等话语策略实现。三种价值相互关联，依次递进，由内及外，由语言到社会，由个体到群体层层展开。经验是个体层面，关系是群体层面，评价是社会层面；与之相对应的是个人经历、人际关系、文化身份。作者在分析的最后，提出电视纪录片是社会文化产品，而不仅仅是影视制作者的个人产品。纪录片以讲故事方式强化主流价值观、思想观念及文化身份。纪录片的一项功能是突显他文化的“越轨行为”，并将所谓的潜在危险传达给受众。在此过程中，母体文化共识得以传播，个体文化成员则在主流价值体系中受到新的洗礼。因此，纪录片不仅呈现中国历史文化之“事实”，更为观众解读中国提供特定视角。关于后者，作者指出，再现中国与评判中国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任何版本的中国形象都是一种构建，最终的电视文本实现有权力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他强调，分析纪录片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话语策略与权力关系并不是割裂的不同范畴，而是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表现出的不同侧面。是权力关系决定了机构在表达自身意识形态时运用的话语策略，而话语策略的具体运用则取决于机构意识形态表达的具体语境。

第八章《结论》对全书的分析研究进行归纳。作者指出中国形象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变迁，中国形象的构建应在 21 世纪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作者认为传媒报道并非仅仅强化价值观及文化身份，它也为探索经验世界的真实性提供了机会，因为外部经验世界是新鲜信息的主要来源，新鲜信息可以挑战或者质疑业已形成的观念，进而推进对中国的理解。对中国的不同刻画反映了对中国的多样的理解和评估。中国形象的多面性，从现有权力关系来看，是表征世界里的话语之争。在新闻报道中，是权力关系构建了对中国的主流态度，决定了某个版本中国形象的权威性，进而压抑了其他版本的中国形象。尽管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报道在短期内仍局限于以“进步”为特征的现代性话语框架内，但是，“文化再现”不等同于“现实世界”，毕竟文化再现真正的功能是建构本土文化共识，强化文化身份，及复制主流传统与价值观。

3. 结语

从以上对该书各章内容的概述中可以看到，该书以“叙事”和“话语”两个概念和相关理论贯穿始终。通过选取具有典型特征的纪录片，通过对不同叙事特征的描写、对不同研究视角的探究，该书对英国纪录片再现和建构中国形象进行分析研究。作者围绕“叙事”和“话语”对不同文化背后意识形态的洞察不可谓不深刻。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学术研究大多集中在叙事分析和话语分析上面。这方面的研究多以英文在国外发表，国内的文章有作者在《话语研究论丛》（第二辑）上发表的论文《话语的叙事分析法：理论、方法与实例》（曹青，2016）。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该书是作者十几年对英国纪录片对华报道研究的成果。书中部分章节的内容曾经在多个学术期刊发表，但

集结成书出版时作者对这些文章作了全面的重写,对内容也作了更新。阅读该书,没有任何碎片之感,相反,却领略到一种全面和系统的叙述。事实上,这本书对1980~2000年几乎所有在英国国家频道(BBC1、BBC2、ITV、Channel 4)播放的中国主题的电视纪录片进行分析,其素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足以支持分析研究所得的结论。而且,书后附录1列出了这一时期核心和关键的关于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名,这对后续的研究也是一个基础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New York: Longman.

Hall, S. 1997.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n Stuart H.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Woodward, K. (ed.). 1997.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曹青, 2016, 话语的叙事分析法: 理论、方法与实例, 《话语研究论丛》, 第二辑, 1-21页。

作者简介:

穆浩, 男,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理论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